

心灵 火花

树先生

■张金刚

就凭年岁、体貌、大智无言的气度，树配得上以“先生”相称。特别是仰视太多老树古树后，更坚定了我对其之尊崇。

为开枝散叶之需，祖父搬离老家院另起新居，至父亲垂暮已半个多世纪。及至在老宅基地再盖新房，春季帮父母迁人，才因惊喜于满树雪白馥郁的梨花，与院外那株比祖父还要年长些的老梨树再度相见。

父亲在树下安了鸡舍，旁边是一盘停转的石碾。翠绿的老梨树欢愉地俯看着父亲蹒跚归来，身后尾随着中年的我。初秋，梨子依旧不招人待见，啥时候熟的我从未在意；没人摘，就再次交给鸟雀和大地。对我们曾经的舍弃与继续的不眠，梨树从不怪怨，一直欢喜地站在那儿，奉上一季又一季梨花、树荫、梨子、红叶、孤枝，不管树皮又龟裂了几许。

傍晚，坐在碾盘上发呆。梨叶哗哗，我似听懂了梨树细碎讲述的祖上的故事，因为它都亲眼见过。炊烟裹着饭香飘来，父母已无力再为饭菜的软硬咸淡争吵，边拖牙床吃力地嚼着，边望着夜栖的鸡们

飞上梨枝，呼啦啦乱颤，像看着曾攀树摘梨的我；我看着父母，像看着飘零的老梨树，又像看着我自己。

一直对城南的几百亩枣林念念不忘，心怀崇敬。据说，清代一县令从山东千里迢迢引进枣树苗，鼓励乡民栽植，抗战时期充作军粮，饥荒时期果腹保命，更是当地枣农的增收倚仗。这“英雄树”“救命树”“摇钱树”在山地繁衍生息几百年、几十年不等，将根扎在坡岭岭，更扎在几代枣农的心上。

枣树开花的时节我去过，满沟满坡飘逸的甜蜜花香，从无数朵淡绿的枣花中散播开去，更引来蜜蜂忙碌着酿造枣花蜜。枣子成熟的时节我去过，颗颗红枣挂满枝头，脆枣甜爽汁如蜜，干枣甜糯肉如馅，一筐筐挑下山梁，挑出红红火火的日子。不知是侍弄枣树练就了勤劳的品性，还是生性勤劳的枣农造就了一方枣林，人养树，树养人，树与人形成了内在的契合，生生不息。

我生活的小城有条老街，已颓败多年，至少有两代人搬迁出街，不再回来，只留部分老街坊守着老

街巷，守着沿街的那三棵老槐。那三棵槐，我虔诚地经过树下不知多少遍，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。街内所有婚丧嫁娶，一切喜怒哀乐，都逃不过老槐的眼，却走不进它的心，它只管微微一笑，摇摇叶子。

如今，老槐下的新华书店还在，书香依旧，一迈入脑海中还是原来的模样，那是我知识与文学的源起。老槐下的烧饼摊儿也在，于街角处、门楼下飘出缕缕芝麻香，永远牵着周边及游走八方老街人的味蕾与乡愁。老槐下的书院、牙科、修理铺、蛋糕房……显得有些落寞，但老槐用葳蕤告诉我：“这就是生活，荣衰交替之间，就是发展。”

我曾拜访过一隋唐石窟山顶的老栎树，几百米的绝壁之上，栎树高大繁盛，栎子、叶子落了一地，却也掩盖不住那凸出于岩石之间的粗壮树根，树根伸向何处，才能抵挡上百年风雨？惟有惊叹。我也曾拜访过深山峡谷仙人寺的古松，相传“先有仙人寺，后有五台山”，是因寺有松，还是因松有寺，不得而知，但松与寺相伴千年，看遍自然轮转、世事沧桑，自

是山野智者。

我曾拜访过故宫、天坛、景山以及陕西皇帝陵、南京中山陵等地的古柏古松古槐，遒劲苍老的树干镌刻满历史故事，可青翠鲜嫩的枝叶分明又沐浴着时代春光，引无限遐思。我还曾拜访过海拔两千米原始森林中遮天蔽日的落叶松，生云生风，生鸟生虫，宛若高山秘境，藏有万千气象；我漫步其中，只是尘世匆匆过客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其实，树先生就在身边，它迎我们而来，送我们去，依然在那里。世间一切，树都知道。树无言，而这正是对一切疑惑的完美回答。因此，值得我们随时随地给树先生一点“细节时间”，让一花一木、一花一果，哪怕一块树皮、一根枯枝、一眼树洞，与心灵、触觉、世事来一场洞穿时空的碰撞与对话。仰树木之高，探树木之深，感树木之远，便可豁然开朗。

树，是一个神奇又深邃的物种与存在。我愿活成一棵树，向地向阳而生，傲然孑然于世，活出自己的节奏与风格。我愿尊树为师，奉为先生，不时叩问，指引余生。

行路 万里

在青藏高原山村度过的那个寒冬，如同一幅简洁冷峻的简笔画，镌刻在记忆深处。每到寒风萧萧的深冬，总会浮现眼前。尽管感触更多的是彻骨的冷，但那份清冷静谧下的纯粹，更常常让人怀念。

初到青藏高原，虽然心里早有准备，但冬天来临的时候，彻底的寒冷和萧条依然让我惊悚。冬天来的早尚是其次，一场接一场的大雪，使得目光所及处顷刻间就被白茫茫覆盖。雪，似乎落下来就再也不会融化，一层一层地重叠起来，静默无声地陪伴村庄整个冬天。

事实上，青藏高原冬天晴天的时候很多，即使下雪，似乎都是在晚上，白天更多的是湛蓝的天空和明亮的太阳。一尘不染的雪在阳光下白得刺眼，似湛蓝的天空飘落地面的洁白云彩。太阳明晃晃地俯视着厚厚的积雪，一层层雪仿佛冻住了一般，用萧瑟透骨的寒气长久地与阳光对视着，固执、冰冷、桀骜不驯，直到由洁白冷成青白色，镀上一层晶莹的冰。

冬日，青藏高原的大地除了这片青白就是灰黄，再也找不到一丝绿意。阴山山坡上曾经绿得发亮的成片松柏，被层层积雪掩埋，偶尔透出一丝青灰色。

冬天的村庄似乎进入休眠状态，人们躲进屋子里，很少出门。那些低矮的土房子在茫茫雪中模糊成一片。即使常常晴空万里，空气依然带着如从冰层深处打捞出来一般的寒气，虽然洁净，但终究带着萧杀与刺骨的冷。连那些在湛蓝天空下枯干的紧贴地面的低矮茅草，也被冻得一根根似针芒挺成凌厉的模样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柔软。

冬天的青藏高原，地下一米左右都已冻得硬挺，可想而知，地面的雪或没有腐化的植物自然会被冰包裹。路面上因一层复一层的雪，变得硬挺而光滑，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，仿佛大地一声声疲惫的呻吟，让人小心翼翼，唯恐踩疼它。

正午阳光加上炉火的烘烤，人家屋檐有时会有融化的积雪，但一边滴落，一边结成冰，顺着屋檐或伸出屋外冒烟的炉筒口垂挂成土黄的冰挂，似一柄倒挂的利剑。冰凌对着的地面，早已留下如同蜡烛滴落的圈圈晶莹烛泪。

每到正午，寂静的村庄才会有一丝动静。村庄后面的山坡上，有牛马或羊在一片灰黄青白里移动。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穿着厚重羊皮袄，蜷缩着身子，双手抄在厚重衣袖里的人们聚集到一个草垛前的空旷处，晒一会太阳。也有顽童在大人的协助下，扫开一处积雪，拿了藤萝绳索和米糕扑草垛上叽叽喳喳的麻雀。

青藏高原冬天的村庄，冷清，简单，洁净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慌不忙，悠闲，恬淡，仿佛这不肯融化的积雪，悠悠地打发着无比漫长的冬日清闲时光，等待着春天的来临。

青藏高原的冬天

■贾炳梅

风物 杂谈

薛涛笺

■鲍安顺

蜀中自古产纸，品质甚佳，制以为笺，早有盛名。

浣花溪，位于四川成都西部，是锦江支流，那儿也产纸，是唐代四川造纸业的中心之一。

唐代女诗人薛涛便居住于此。她爱写诗，对纸张要求甚高。不满于纸张尺幅，薛涛招募和指点工匠，采溪水，自制纸，找来荷花、桃花、鸡冠花等各种红花，在瓷钵里捣成花泥，再加入清水调色，将裁好的楮皮纸用毛笔蘸花泥水，一遍又一遍地描绘涂抹均匀，将刷过的红色小纸放在屋子挂起来晾，或拿到太阳下晒。

起初，干后的纸面起皱，不能用。薛涛为此愁眉不展。有一天，她翻阅诗书时无意中无意发现，几天前一张涂抹过的小纸夹在书页内，小纸已干，纸面平整。薛涛恍然大悟，便用一张张吸水麻纸附贴印染纸，互相迭压，成摞阴干，纸干后外观不晕，如书内夹纸一样，还解决了一次制作多张色纸的问题。

薛涛制成的纸笺，精美小巧，色彩艳丽，便于携带，也宜于交流。象征着热情、喜庆的红色，逐渐成为薛涛笺的代表色，深受人们喜爱，并用来作诗、写信。薛涛还在纸上配上暗隐画纹，再加上俊逸的行书，清雅脱俗，一时风行，成了文人雅士的收藏珍品，被称为“薛涛笺”。后来，官方的国札也用此笺。

薛涛笺，在我国制笺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历代都有仿制。宋朝时，用产于四川乐山胭脂树的花染色，发展了胭脂版纸笺，这种纸笺也称为薛涛笺。可以说，薛涛是加工纸的技术革新者。

除了发明“薛涛笺”，薛涛在诗词、书法方面的造诣也相当深厚。她在《送友人》一诗里写道：“水国蒹葭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苍苍。谁言千里自今夕，离梦查如关塞长。”此诗清空如洗，其间蕴意无限，藉藏着无数的曲折与美好。昔人曾称薛涛“工绝句，无雌声”，说她的字，妙无女子气，笔力峻激，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，只可惜，她虽然名贯古今，但书法的真迹却已佚失。

后来，据说薛涛一直居浣花溪畔，终身未嫁。她建吟诗楼于碧鸡坊，晚年好作女道士装束，与当时著名诗人元稹、白居易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杜牧、张祜等人都有唱酬交往。王建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诗称道：“万里桥边女校书，枇杷花里闭门居。扫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领春风总不如。”



雪原

汤青 摄

人生 行板

豆腐往事

■周存亮

酿酒、打铁、做豆腐，在家乡常常被称做最苦的三件事。酿酒、打铁这两件事的苦我说不来，做豆腐的苦却是深有体会的。

那时感觉最烦心的，就是拣黄豆。做豆腐的黄豆不但要拣去碎屑尘土，还要拣除霉豆和异物，霉豆影响豆腐的口感，异物会坏了磨齿。那时豆腐买卖称为“换豆腐”，用自家产的黄豆来兑换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等。豆腐是白白净净的，村邻竹篮里的黄豆质量却参差不齐。祖母有了空，就要把这些“百家豆”不停地簸筛、挑拣，地上落下一层又一层灰的豆腐沫，紫的畸形豆，乌的发霉豆，红的砖瓦粒，各样的钉头铁丝，中间还时时夹杂着黑的麦粒状老鼠屎。一响又一响的时光，就在这挑拣中悄然而去。每当我放学归来，戴着花镜的祖母就会抬头说，刚拣了两簸箕，又该做饭了。

周末，写完了作业，我也要拣黄豆。簸箕放在矮凳上，我

半蹲着，勾着脖子，伸着脑袋，分拣各样杂物，一会儿功夫，就背酸颈痛、头晕脑胀了。听着外边伙伴们的欢笑，心里一憋屈，就认真不起来了，两只手在簸箕里只管一拨一拨地划拉，管它老鼠屎还是羊粪蛋，都懒得拣出来。祖父在黄豆的筛选上，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，祖母常常不得不翻工重拣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正是祖父的苛刻，四邻八乡才都说我家的豆腐做得好吃。

一年里除了夏收秋收时节，磨坊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做豆腐很占地方，要有装磨的磨坊，煮浆的大锅，点浆的水缸，压豆腐的木架，包豆腐干的桌子，晾豆腐干的长箔，排水的池子，放豆腐渣的盆盆罐罐等等。老宅的院子不大，满当劲可想而知，常年没有个下脚的地方，到处弥漫着豆制品的浆水味。

做豆腐很费工，泡豆磨沫、煮浆点卤这不说，单单包豆腐干一项，是用上多少劳动力

都不嫌多的。五寸见方的白稀布平摊好，舀上一勺点制好的豆腐脑，对角提起，交叉折叠，把豆腐脑严实实地包紧，整整齐齐码放在筛子上，再放入笼屉里压扁，压得越薄越透，越容易入味。豆腐干常常供不应求，但包起来太慢了，用祖母的话说，是“家有百口，难闲一手”。我也搭过手，四个角总折叠不匀，豆腐脑还不老实地溢出来，压出来的豆腐干品相差，只好自吃或送人。祖父常说，换咱的豆腐就是信得过咱的人，怎么能马虎呢。

做豆腐还费时，每到冬闲，农村办婚事的多起来，订豆腐的也多起来，家里两口锅不是煮豆浆，就是泡豆腐干，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做饭，加之我对家里的豆制品实在不感兴趣，因此那时我常用煮豆浆的灶膛烤馍吃。如今，家里不做豆腐已有十多年了，我还是几乎不吃豆制品，但那段豆腐往事，给了我莫大的温暖和无尽的回忆。

故土 感怀

记忆中的煤油灯

■乔金敏

小时候，家家户户用来照明的都是煤油灯。记得我家当时只有两盏煤油灯，一盏带有玻璃灯罩，一盏不带灯罩。

不带灯罩的煤油灯像流动的哨兵。经常被母亲提着从厨房到卧室。如果风从没糊紧的窗户中钻进来，母亲就伸出右手像一面扇子那样遮挡着。当然，脚步要轻，要慢，不然，身体带来的风也会吹灭那柔弱的光亮。

带有灯罩的煤油灯是夜晚家中一轮明月。勤快的父亲每天都把玻璃灯罩擦得干干净净，放在堂屋的饭桌中间。晚饭后，母亲在灯下缝补旧衣服、纳鞋底，做一些针线活，而我就趴在桌上写作业、背课文或者胡乱涂鸦。

有时候，会被一两只飞蛾打扰，我就握着笔，凝视那飞蛾围绕灯光飞来飞去的样子，觉得挺好玩。而母亲则不以为然，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就把灯罩取下来，飞蛾径直向灯火扑去，只听“刺啦”一声，被烧焦的飞蛾像一只黑苍蝇似的掉落在灯旁……青涩而懵懂的我，还不知道“飞蛾扑火”的含义，只得低下头乖乖地写作业，生怕被母亲责骂。

待我写完作业，全家人就吹熄灯盏上床睡觉。那时候，煤油紧缺，凭票供应。为节省灯油，都早睡早起。

我常常不能很快入睡，就在床上缠着母亲讲故事。

上初中时，学习任务加重，煤油灯陪伴我的夜晚就多了，时间也加长了。每晚我都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复习功课，母亲也顾不上节省煤油。可我还是知道节约的。我把用细纱搓成的灯芯挑得很短，只要能看见课本上的字就可以，大约只比古书上说的“凿壁偷光”略好吧。若是在煤油灯下待时间长了，遇到灯油不多、灯芯起花冒烟，第二天鼻子里都黑乎乎的。

就是这样的煤油灯，伴我走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陪我读完了小学、初中并考上了高中。当时，村里考上高中的仅我一人，家人高兴，我更高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很感恩那盏煤油灯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乡村基本通电，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电灯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梦想成真，煤油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母亲和我一样，对煤油灯有种别样的感情，她健在时舍不得扔弃，就用旧皮袋子包裹好，放在老屋墙角。后来，随着母亲去世，老屋拆除，我到城里工作，那盏煤油灯也无人问津，不知去向。但于我而言，最初点亮我人生旅途的是那盏亲切的煤油灯。至今，它仍在我的记忆中闪烁着爱和希望的火苗。